

外 教 社 翻 译 研 究 丛 书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

张美芳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 教 社 翻 译 研 究 丛 书

H059/73

2005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

张美芳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张美芳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ISBN 7-81095-667-1

I. 翻… II. 张… III. 翻译理论—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0357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吴文子

印 刷: 常熟高专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8.125 字数 228千字

版 次: 2005年8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2 100 册

书 号: ISBN 7-81095-667-1 / H · 259

定 价: 14.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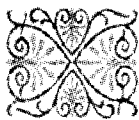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总 序

翻译研究是不是一个学科,翻译有没有“学”,现在不应该再费时论争了。董秋斯 1951 年就提出要建立翻译学,要写出两部大书,一部是《中国翻译史》,另一部是《中国翻译学》。苏珊·巴斯纳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为《翻译研究丛书》写的总序中第一句就宣称:“The grow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separate discipline is a success story of the 1980s.”(1993)我国 1979 年就开始招收翻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6 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公布了首批“翻译理论与实践”(二级学科)的硕士点,现在已有一大批以翻译研究为学术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1989 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都陆续设立了一些翻译研究项目,1992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学科分类与代码》,把翻译学正式定为语言学(一级学科)中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虽然这个学科定位还不够科学,但这个学科的存在已被公认。这说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和发展的。

近 20 年来,这个领域的中国和外国学者都在努力加大研究力度,拓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次,陆续出版了不少翻译学研究的新成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满足国内翻译教学的需求和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经过精心选择,引进了一套“国外翻译研究丛书”(现已出版 29 种),这在我国翻译界还是第一次。这套丛书在翻译教学和研究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它的重要参考和借鉴作用。



但是引进与借鉴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结合我们自己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实践进行新的创造。怎样创造?许多学科的发展史证明,要创造就要中外结合。怎么结合?中国学术史告诉我们,要结合就要以自己的研究为根基,以国外的研究为参照,借鉴其理论与方法,改造和创立基本范畴,建立新的范畴系统。这个以自己为主的中外结合的原则就是学科建设的方针,也是我国翻译研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引进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结合我们的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与研究,写出与我们自己的实际密切结合的论著。国内已经出版了一些这样的著作,对翻译学的建设起到了某种程度的推进作用,功不可没。但从理论的系统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来说,我们还没有一本多数人认可的《翻译学导论》。此外,在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性研究、外国译论的借鉴性研究、翻译实践(包括翻译教学实践)中新问题的探索性研究、相关学科(如文化、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社会学、哲学等)的吸融性研究以及方法论的多层次研究(包括本学科的和相关学科的)等几个重要领域,也都缺乏高水平的系统研究的论著。

为了进一步推动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满足这个学科研究生教育的教学与研究的需求,我们特别组织国内专家撰写以翻译学学科本体研究为主的系统的理论性论著——“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在筹划此套丛书时,我们了解到中山大学“985”学科建设项目中也正组织编写“中山大学翻译研究丛书”;我们很高兴把他们的这些选题纳入到“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中来。本丛书是一个开放性的系列,我们撰写、约稿的原则是:(1)为翻译研究类的学术专著,应充分反映本领域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2)追求理论的系统性和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目的是对翻译学的发展和翻译人才的培养能起重要的推动作用;(3)用汉语撰写。读者为高等学校翻译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师、研究生,翻译学界、语言学界以及文学、哲学与心理学等学界的翻译工作者和爱好者。

翻译是人类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之一。I·A·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曾说,翻译很可能是宇宙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最复杂的一类活动。



它的复杂性必然对我们的研究构成挑战,要求我们的研究不断拓展,不断创新,不断深化。从古至今,大体说来,人类对翻译的研究已有了直观经验式的、文艺学的、语言学的、文化学的等多种视角和方法。我们相信,我国的学者一定会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一道,对人类这项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断加以探索,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编委会

3

总
序



从语言功能切入翻译研究

(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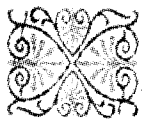
翻译离不开语言。

这既是说,若没有语言,翻译就无所依附,同时又是说,若没有千差万别的语言,也就不需要翻译。因此翻译与语言有天然的联系,要理解翻译必得理解语言。

语言是什么?语言学家对它作过各种描述,下有各种定义。我还是愿意引用许国璋先生的一段论述: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的信息的载体和容器。”

这里点明了语言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功能。语言是一种符号。符号必有系统。系统则有自己的一套严密的规则。语言符号系统最重要的功能,一是交流情感、沟通信息(人与人关系),一是认识和描述世界(人与客观世界)。这是许多语言学家都谈到的人类语言的基本功能。但是,语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即记载和传承上述基本功能之结果。这一记载、传承功能使人类的经验得以超越时代、跨越地域,使知识得以积累,社会得以进步;同时,语言由于这一传承,沉淀了更丰厚的文化内涵。这使一种语言不仅在结构和规则上与其他语言相区别,更在语义及其内涵外延上形成自己的独特性,使语言之间的转



换——即翻译——更加困难。

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则性和功能性是所有人类语言的共性,但同时也是导致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个性或区别于其他语言的特点的原因。人们常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翻译的根本理据。但不同语言社团的人在认知与描述时,在交流与沟通时,他要依照所使用的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则,而且由于传承的关系,文化会使他的认知与描述、交流与沟通都带上其特有的色彩。这些规则上的差异和表述上的色彩就成了翻译的障碍。仅靠“心同此理”显然是解决不了具体的翻译困难的。

我们说翻译离不开语言时,并不意味着翻译是语言的附庸,或语言可以完全离开翻译。本来,翻译与语言几乎是共生的,没有脱离语言的翻译。但我们不难看到,前面讲到语言的三个重要功能,若没有翻译,就难以充分展开。从交流和沟通说,没有翻译,人们只能在本地域而不能跟各地的人交流和沟通;没有翻译,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描述也受到局限,不能同其他地域不同语言的人们相互交流和争辩;没有翻译,知识的传承范围有限,受益范围有限。所以,翻译可以说是语言功能的有益补充。

因此,正是在功能上,我们看到语言与翻译的紧密联系,看到对于翻译过程的描写和翻译现象的认识,需求助于语言理论和语言分析,看到从功能角度切入翻译研究的必然性。

这还只是从宏观上看语言与翻译的功能,要深层地切入复杂的翻译研究,还需从微观上细作分析,还需借助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特别是著名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翻译是在原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寻求对应的转换;如对应关系的焦点放在词汇语法层,转换就可能偏向直译,如对应关系的焦点放在语句以上的语篇层,转换就可能偏向意译。但翻译的转换不能只考虑概念意义,还需寻求人际意义(如语言表述者的角色、态度、动机等)和语篇意义(如表达方式、修辞形式等),而这几方面意义又最终可能指向制约语言的社会文化语境。使两种语言同时在这几方面都达到满意的转换,是翻译永远的难题。

因此,基于功能语言学而产生于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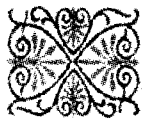


(如早期的凯瑟琳娜·赖斯), 翻译应视特殊需要, 有其特殊的追求, 即译文与原文可能会有不同的功能。后来的目的论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表述, 强调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需求, 并将其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解释。我们也许不妨将上述研究看作是从内部和外部两种功能途径对翻译的切入。它们都有其对翻译理论研究的贡献。

但是以往我们翻译界在这一点上做的工作还很不够。我们考察过我国(包括港台地区)从前五年到前十年(即 1995 - 1999)这五年间发表在各种学术期刊上的关于翻译研究的论文, 所得 3 000 余篇, 涉及理论探讨的占四分之一以上, 即七八百篇, 其中从功能角度论述翻译的仅四五篇。如较早的有杨莉藜关于系统功能翻译学的两篇导论, 刘英凯从功能语法理论的层次观看翻译, 仲伟合等对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介绍, 是比较初步的探讨。绝大多数文章是讨论翻译的性质、标准、直译意译、归化异化、等值等效, 或从语用学、语篇学、符号学、跨文化研究等方面探究翻译以及国外理论介绍和翻译学科建设。

令人欣慰的是,《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弥补了我们在这方面的缺憾。作者张美芳教授既熟悉功能语言学, 又了解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 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种功能途径切入翻译问题。在其理论篇中, 她以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作翻译的微观分析, 以德国功能派理论作翻译的宏观分析。她熟谙各派理论及其来龙去脉和相互关系, 以及各家理论的长短强弱, 评之有据, 论之有理, 使读者能由此了解从功能的角度切入翻译研究有怎样的理论、原则、方式和长处。

作者从系统功能语言学主要借鉴的是韩礼德的语篇分析模式。从其模式可以看到, 语言功能在语言表层结构中的实现是与社会文化环境紧密相连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了要用什么样的语篇体裁, 而语篇体裁的体现则决定于语境中三个重要的因素, 即“语域”(register)分析中的三个变量: 语场(field)、语旨(tenor)、语式(mode)。语场指的是正在发生什么事, 所进行的社会活动的性质、特点、语言所谈及或描述的是什么; 语旨指的是谁是交际者, 他们的基本情况、特点、地位、角色、关系等; 语式指的是语言在交际中所起的作用, 包括交际渠道和



修饰方式。语场、语旨、语式跟语言的三个纯理功能相互联系：语场体现了语言的概念功能，语旨体现了语言的人际功能，而语式则是语篇功能的具体体现。这些是作者书中一再参引的分析模式，因为作者认为韩礼德的理论框架可以描述从社会文化环境到语篇体裁、语域、话语意义与话语结构各种层次的现象及其之间的关系。

作者还将 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 在《语篇语言学入门》一书中提出的语篇特征七个标准——衔接性 (cohesion)、连贯性 (coherence)、意向性 (intentionality)、可接受性 (acceptability)、语境性 (situationality)、信息性 (informativity) 和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与翻译理论家 Roger Bell (1991) 对此的解释加以比较。前者认为语篇作为一种“交际活动”，应具有这七项标准。如果其中的任何一项标准没有达到，语篇就失去了交际性。Bell 将其应用于翻译研究，作了下面这样的阐释：

- (1) 语篇内的小句如何相接？(衔接性)
- (2) 语篇内的话题如何发展？(连贯性)
- (3) 作者/讲话者为什么要制作此语篇？(意图性)
- (4) 读者对该语篇的反应如何？(可接受性)
- (5) 该语篇告诉读者什么？(信息性)
- (6) 该语篇的功能是什么？(语境性/关联性)
- (7) 该语篇和其他语篇有什么联系？(互文性)

作者随即以 Bell 的问题举例进行检验(见书中第二章)。如此将功能语言学的语篇理论和应用于翻译研究的理论加以比较并以实例进行检验，在书中不止一处，颇有新意。

另一方面，作者不停留在理论层面。在理论阐述之后，书中“实践篇”即以英汉语翻译实例作进一步的分析，如以功能语言学观点，联系文本体裁和语场、语旨、语式等要素，分析翻译中的种种问题和疑难，对比了功能途径与其他途径在翻译研究上的不同之处，解释了以往理论所不易解释的许多翻译现象。例如第四章里以金庸文章提及的原文和译文为例，对双语转换后语场、语式、特别是语旨的变化，细致地加以分析，体现了功能途径对于翻译问题的解释力。这样的实例在全书的后半部分里随处可见。



总之,张美芳教授这本新著构思严谨,前后照应,相互关联;以理论篇综述和讨论各种翻译研究的观点和特点,以实践篇分析和解释实际翻译过程以及译者策略等。书末还附有许多相关的术语及其中文译名,附有完备的参考书目。我们的翻译研究领域因此有了一本详论功能途径的著作,翻译理论爱好者和翻译专业研究生有了新的参考书,是可喜之事。

王克非

2004年8月31日

9

从语言功能切入翻译研究(代序)



前 言

关于翻译研究

在我国,人们已经习惯于用“翻译学”一词来指称翻译研究整个领域。翻译学作为一门研究翻译现象的人文学科,其学术地位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本书所说的“翻译研究”既指作为学科的整体领域,也指这个领域的某种理论及其指导下的研究方法。

20世纪60年代左右,翻译研究尚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20世纪70年代左右,翻译学者开始大量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来构建本学科的体系,所引进的理论包括:现代语言学、交际理论、文学理论、人类文化学、哲学,心理学等。到了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两大学术流派:文化学派和语篇分析学派。文化研究学者开始探讨“翻译学的文化转向”(Bassnett and Lefevere 1990),提出从文化研究衍生出来的、强调意识形态作用的研究模式。语篇分析学者们“研究的是语言意义和社会与权力关系在交际中如何体现。韩礼德的系统功能模式是目前语篇分析中影响最大的分析模式”(Munday 2001:88)。

不过,翻译学者们认识到,任何一种研究途径,不管有多缜密,都不可能回答学科中的所有问题;任何研究手段和方法论也不可能满足翻译研究领域各个分支的需要。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积极地认可而不是排斥翻译学研究途径的多样性。这些学者虽然对具体研究方法的某些方面持批评态度,但仍然把各种研究途径看作是互补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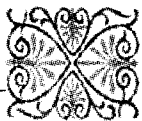
非相斥”(Baker 1996a; Venuti 1996)。

如今,翻译研究已经冲破了任何单一学科的制约,发展成为一门既独立又与多个学术领域相关的崭新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学者们在这个领域里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理论方法研究翻译现象与翻译问题。根据研究途径或理论基础,可把活跃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学者大致分为几个流派:(1)翻译科学派(即语言学派),该学派的理论基础是对比语言学、普通语言学和语言哲学;(2)功能主义学派,其理论基础是功能语言学及与之相关的语篇分析理论和语用学;(3)操纵派,即比较文学—文化学派,其理论基础是文学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文体学;(4)多元系统论,其焦点是社会与文化规范;(5)解构主义学派,该学派把翻译比喻为原文在翻译中得到“解放”;(6)翻译技术学派,该学派的学者多数是信息技术专家,他们借助人工智能理论研究机助翻译、机器翻译及信息提取等问题,并开发相关的软件等等。

关于功能途径

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起源于功能语言理论。梅森(Mason in Baker 1998)认为,有三类学术思想对功能翻译理论产生影响:(1)英国功能语言学派。该学派的学术思想始于弗斯(J. R. Firth),并在卡特福德(J. Catford)、韩礼德(M. A. K. Halliday)等学者的著作中得到体现和发展;(2)交际能力论。海姆斯(D. Hymes)创立的理论,是对乔姆斯基(N. Chomsky)语言能力论的回应;(3)目的论。该理论产生于翻译学内部,源于布勒(K. Bühler)的语言功能理论。目的论认为翻译行为所包含的交际意图/目的(purpose/skopos)或功能(functions)是译者决策的根源所在。

本书所说的功能途径,既指以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为基础的翻译语篇分析学派及其研究途径,也指以布勒(K. Bühler)提出的语言功能模式为指导思想的德国功能主义学派及其研究途径。前者以英国学者为主,其沿用的理论框架比较固定,研究方法细致,或自上至下或自下而上研究语篇的功能,因此我称其为“微观翻译功能”;后者以德国学者为主,其视角比较宽,强调的是



译文在目标语环境中的功能及根据不同的文本功能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我称其为宏观翻译功能。

然而,任何分类都不可能是绝对的,事实上,在微观翻译功能的研究中有宏观的指导,宏观翻译功能中也有微观的阐释。此外,我在本书所说的英国学派和德国学派,是指翻译学中两种不同的功能研究途径,而不是严格的区分不同地域的学术流派,更不是按国籍分类。例如,英国学者纽马克(P. Newmark)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策略与德国功能学派的语篇类型与翻译策略相似与相关;而豪斯(J. House)的翻译评估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了韩礼德的语域分析模式。因此,我把英国学者纽马克的语言功能理论及其翻译策略归类为德国功能主义学派,而豪斯的翻译评估模式则纳入英国语篇分析学派之中。

关于“语篇”与“文本”

术语的翻译问题永远是个难题。本书遇到最大的难题是“text”和“discourse”两词的翻译。我们(张美芳、黄国文,2002)曾专门讨论过由 discourse analysis 和 text analysis 所产生的困惑及处理方法。一般说来,英美国家的学者喜欢用 discourse analysis,而欧洲大陆的学者则喜欢用 text linguistics,因此译者们通常也有意将其译成“语篇分析”和“篇章语言学”以示区别。随着语篇分析队伍及其影响的扩大,在我国大陆地区,人们似乎已经有了共识,那就是把 discourse analysis 和 text analysis 都译为“语篇分析”。

出于以上原因以及出于统一术语的愿望,我开始时尝试把书中所有有关“discourse”和“text”,“text type”,“text functions”等等概念,都处理成“语篇”、“语篇类型”、“语篇功能”。后来,王克非教授阅读本书的初稿后提出,已经有学者把德国功能主义学派中的“text type”、“text functions”等概念译成“文本类型”、“文本功能”(见朱志瑜2004),如果本书另译一套可能会造成术语的混乱。我觉得他言之有理,于是,把第二章中所讨论的英国翻译研究学派称为“语篇分析学派”,而德国功能学派中的术语“text”,“text type”,“text functions”等译为“文本”、“文本类型”和“文本功能”。



本书的编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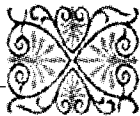
我把整本书分为理论篇和实践篇两大部分。理论篇共三章,第一章介绍翻译研究的范畴与各种途径;第二章评介语篇分析学派的理论基础及其研究途径;第三章评介德国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基础及其研究途径。实践篇共两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其中部分篇章根据作者已发表的论文改编而成。实践篇主要将功能理论用于讨论英汉翻译中的问题,第四章和第二章相联系,所引用的语篇分析理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第二章所涉的语言学家或翻译理论家;第五章和第三章相联系,讨论英汉翻译的功能与策略问题。最后,我还提供了主要的功能翻译术语供读者参考。

功能情缘:衷心感谢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直接或间接帮助我完成此书的人。

首次接触“功能途径”这一术语是在我的大学年代。那时,我们的老师、著名英语语音专家方淑珍教授在课堂上推行一种叫做“意念/功能途径”的教学法(Notional-functional approach)。这种教学法也简称为“功能途径”,或叫“交际途径”(Communicative approach),是六十年代后期在英国开始出现的,其最大特点是重视语言的功能,重视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把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作为教学的根本目的。虽然外语教学中的“功能途径”和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不可同日而语,但两者却是同宗同源。方淑珍教授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使我对“功能途径”产生了永不消减的兴趣。

我比较深入地研究功能途径及其影响是在香港浸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的博士论文试图对我国解放以来出版的英汉翻译教材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归纳各类翻译教材的特点,追踪其理论根源,探讨其优点及可改进之处。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将当时收集到的一百多种英汉/汉英翻译教材作为研究对象,并根据其理论倾向将那些教材分为三大流派:(1)词法、句法流派;(2)功能流派;(3)当代译论流派。我对其中的功能流派情有独钟,因为此类翻译教材中明显地有着我所熟悉的意念/功能途径外语教材的影子。



为了对功能流派翻译教材的理论根源有更多的了解,我在香港浸会大学选修了由高德熙(Mohsen Ghadessy)教授讲授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导论”、“功能语篇分析”等课程。高德熙教授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知名人士。他在课堂上对主位理论、语境论和话语变数、语言的三大功能等方面的阐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对我后来把功能语言学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起到启蒙的作用。

我要感谢高德熙教授还因为,通过他的引见,我在香港认识了功能语言学界的两位泰斗,大名鼎鼎的韩礼德(M. A. K. Halliday)教授和哈桑(R. Hasan)教授,并得到他们的教诲。曾记得,1999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中山大学,刚好碰上“语篇与语言功能国际会议”在中大召开,韩礼德和哈桑两位教授是那次大会的主题发言人。我匆匆地用英文写了一篇有关语篇与翻译的文章提交给大会组委会(此文章的中文版后来发表在《上海科技翻译》1999/4)。可能由于我是功能语言学界的门外汉,我的论文被安排在最后一天最后一个时间段最偏僻的地方宣读,我以为在我发言时听众已经所剩无几了。出乎意料的是,韩礼德和哈桑两位教授坚持听完我的发言并肯定了我把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的努力。他们的鼓励与指导使我增强了通过功能途径研究英汉翻译的信心。

此外,本书提到的多位专家曾给我莫大的鼓励与支持,他们是:贝克(Mona Baker)、纽马克(Peter Newmark)、梅森(Ian Mason)、哈提姆(Basil Hatim)和曼迪(Jeremy Munday)。我于2002年下半年在英国 Middlesex 大学做访问教授期间,专程到他们的学校访问过他们(见张美芳 2003a),并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联系。在写此书的过程中,我碰到问题向他们请教,他们总是有问必答。

我要特别感谢黄国文教授,没有他的开拓精神与精心策划,“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的概念就不会产生,本书的完成与出版也就可能遥遥无期。我还要感谢王克非教授,他从头到尾细读本书的初稿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我的研究生陈宁、谭娟、阎喜、罗兰、宋晓东对全书进行了认真的校对,澳门大学博士研究生李炳南帮忙描绘图表,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的研究和撰写得到中山大学学科建设“985”规划项目和澳门



大学研究委员会的资助。两所大学对我的厚爱与支持是我完成此书的
最大动力。

本书记录了作者对翻译研究功能途径的观察与理解。观察可能会
片面,理解可能出偏差。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张美芳

2004年8月31日